

吴小英 著

# 回归日常生活： 女性主义方法论与本土议题

本书贯穿始终的理念是，回归日常生活实践，既是女性主义方法论的精髓，也是社会学研究在中国本土议题上的最后出路。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回归日常生活：  
女性主义方法论与本土议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归日常生活：女性主义方法论与本土议题/吴小英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81115-992-9

①回… Ⅱ.①吴… Ⅲ.①妇女学-研究-Ⅳ. ①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5450号

回归日常生活：  
女性主义方法论与本土议题

著 者 吴小英

责任编辑 彩 娜

封面设计 张燕红

出 版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88号(010010)

发 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787×960/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04千

版 期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1115-992-9

定 价 35.00元

# 目 录

导言:日常生活的社会学/1

## 上编:女性主义方法论

“他者”的经验和价值

——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尝试/11

当知识遭遇性别

——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38

女性主义知识社会学素描/65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及其对中国本土研究的启示/111

女性研究与社会学相遇的中国语境:方法论视角的回眸/130

## 下编:本土议题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性别议题/155

市场化与性别话语的转型/179

“干得好”还是“嫁得好”?

——市场化时代女性身份认同危机及其主体性建构/210

代际冲突与青年话语的变迁/240

性别、身体及其他——从性骚扰案的轰动效应说起/259

结语:现代性与性别/282

后记/287

## 导言：日常生活的社会学

我已强调过，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所以，要理解许多个人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超越这些变化来看待它们。由于我们所置身的制度变得更为庞杂，彼此间的联系更为复杂，这种结构性的变化的数目和类型也在不断增加。要想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楚的意识并敏锐地运用它，就要能在大量不同的环境中捕捉它们彼此间的联系。要做到这样，我们就需要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1〕

从1997年我从哲学转行进入社会学的那天起，关于什么是社会学的疑问就始终萦绕脑际。当时对社会学的理解，主要停留于一种方法论的层面：即从智识传统来看，社会学无非是自然科学的成功所导致的方法论上的扩张，试图通过以实证的方式研究社会经验事实，将纷繁的社会现象纳入某种结构性的秩序当中，

---

〔1〕 参见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9页。

从而获得一种普遍的社会法则。然而这种当初奠定了社会学基础的科学主义取向,却为未来的社会学危机埋下了伏笔。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科学主义在西方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由此也引发了社会学危机的呼声,因为“科学主义的衰败使得社会学失去了支撑的依据,那种试图寻求帕森斯式的社会秩序普遍话语的主张遭到了釜底抽薪式地破坏”<sup>〔1〕</sup>。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甚至使得作为知识基础的普遍主义目标也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当时我将社会学的危机理解为“伴随着科学主义的衰落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它表明了正统社会学范式的危机,恰恰为社会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sup>〔2〕</sup>。

然而涉足这个领域越深,越让我深刻地体会到,社会学以及所谓社会学危机的理解绝非如此简单。李猛在分析 9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危机根源时指出,除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跨学科研究趋势的无力以及学术制度本身的缺陷之外,“社会理论想象力的衰竭”是导致其走向终结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衰竭或者危机的一个突出的症状就是“理论与经验的鸿沟之间在日益扩大”,这实质上是个理论问题,表现为社会学这门韦伯当年倡导的“具体现实的经验科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中都远离我们生活的具体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理论想象力的衰竭,正是这种从现实后退的结果”。而这种退却实际上“并非社会学理论有意逃避经验现实,而是因为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以一种‘狭隘’的方式不断地生产一些专供社会学家研究的‘经验现实’”<sup>〔3〕</sup>。也就是说,学科传统本身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桎梏。

---

〔1〕 参见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 1 期。

〔2〕 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1999。

〔3〕 参见李猛,《经典重读与社会学研究传统的重建》,《社会理论论坛》,总第 5 期,1998 年。

李猛对此提出的拯救方案是，通过重读经典来重建社会学的理论想象力和经验感受性，从而重建社会学的研究传统<sup>〔1〕</sup>。

这种被社会学家奉为经典、而又常常被抱怨处于缺失状态的神秘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究竟是什么呢？在半个世纪前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同名著作中，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帮助人们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并把握自身的命运，“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从而完成从“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到“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的穿越。米尔斯反对那种“把社会科学当成一套科层式的技术手段”的做法，认为经典社会分析的基本特征是“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且“它的问题是与其紧迫的公众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直接关联的”，因此他强调社会科学家首要的政治与学术使命，是搞清这个时代困扰人们的焦虑和淡漠的因素，找到它们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并以合适的方式转换为社会科学的问题陈述出来<sup>〔2〕</sup>。

有学者认为，米尔斯有关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论述，“重新赋予社会学以鲜明的公共性和介入性”，当社会学越来越关注和局限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内部承袭下来的问题意识时，独树一帜地强调社会研究者“提出公共议题、介入社会变迁的能力”，这是他在有关社会学重建问题上的最大贡献<sup>〔3〕</sup>。实际上，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家们有关重建社会学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是如特纳所言，“社会理论中只有很少几股传统能够声称，在整个 20 世纪中保持了显见的延续和成长”，其主导潮流表现为更多的分歧和异

〔1〕 李猛，《经典重读与社会学研究传统的重建》，1998。

〔2〕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2001，第 1—24 页。

〔3〕 闻翔，《〈社会学的想象力〉：五十年后再回首》，《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年 9 月 3 日第 7 版。

见,而不是什么成功的积累。就是说,在社会理论中很难看出有什么“明确的、毫无疑义的进步”,加上“未能解决社会理论的概念工具中存在的某些基本争议”,使得社会理论往往在遵从时尚与标新立异之间摇摆不定,结果“不断发现新的话题,也不断弃置旧的问题”。因此特纳认为,“社会理论只有在紧密参与经验研究和(或)公共论题的时候,才会发育得最好,也才会维持得最好”<sup>〔1〕</sup>。也有学者指出,社会学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的公共角色,都“不仅仅在于专家们的技术活动”,也包括“伸张民主、开启民智的公共话语”,还可以包括“将构成日常生活和公共话语的那些概念、公认理解以及文化范畴都交付批判性的理论反思”,而这正是社会学中的批判理论所持有的方案。<sup>〔2〕</sup>

因此重提社会学的公共角色和道德担当,进而重建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努力,除了李猛所说的重读经典,另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重返日常生活。这种重返并非简单地回归常识,而是对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中习以为常的那些常识性思维进行重新检视。社会学与常识之间具有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它们共享着人类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语言,只不过社会学家研究的视角比个人生活世界提供的视角更为宽广,因为它“努力通过分析人类相互依赖的多重关系网络来理解人类的处境”,在“遇到由习惯和相互重中的信念支配的熟悉世界时,充当了一个爱管闲事并且常常惹人气恼的陌生人的角色”,鲍曼将这种质疑常规和常识的过程称之为“陌生化”过程,认为“它会促使并鼓励我们去重新评定我们的经验,去发现更多的阐释这些经验的可能性”,并且使我们“对于目前本来

---

〔1〕 参见布莱恩·特纳编,《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序”,第8-12页。

〔2〕 卡尔霍恩,《社会理论与公共领域》,见特纳编《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2003年,第604页。



就如此的事物或者我们相信它就是如此的事物”具有更多的批判意识,更少的顺从和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思维是一种力量,一种抗固化的力量”,它让我们变得更加敏感、更有领悟力,从而拓展我们的自由度<sup>〔1〕</sup>。

可以看到,这种重返日常生活、给你我带来自由可能性的社会学更具有某种实践和反思的意味,也是女性主义研究所特别推崇的。对日常生活的回归,不仅意味着研究主题直接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并以最终能否阐释作为普通人的主体经验感受作为知识目标,而且意味着从个人的日常实践中寻找社会结构的联结点,并对习以为常的日常观念和公共话语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中传统的结构与行动、客体与主体、社会与个人、公与私的二元划界从此变得模糊不清。对于女性主义来说,建立在官方与民间、正式与非正式、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分界基础上的权威公共话语,既型塑了主流社会的统治和支配模式,也决定了社会学的言说方式。因此只有回归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才能打破单一的权威话语和言说方式,实现私领域和公领域的转换。

将本书的标题命名为“回归日常生活”,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女性主义方法论的精髓就是回归日常生活,这种取向对于理解无论是处在转型社会困扰中的中国普通人,还是处于繁荣背后的困顿中的中国社会学,都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中国社会学自 80 年代重建以来,一直致力于学科规范化运动。这种规范化虽不能说卓有成效,但毫无疑问扭转了社会研究中长期以来习惯性的意识形态路径依赖,转而将客观、中立的方法论规则奉为最高旗帜,并由此产生了一批至少在形式上貌似规

---

〔1〕 齐尔格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高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0-18 页。

范社会学的成果。因此国内的社会学界一直怀有很深的实证主义依恋,“这种依恋的正面效应,就是至少在学界树立一种自主的传统,抵制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界无所不在的威权主义阴影”。但是当这种依恋成为一种盲目的追随,就会流于愚昧和学术八股,从而造就“各种脱离了社会学想象力的‘数字灾难’”,成为新的威权主义或者为威权主义所利用的新道具<sup>〔1〕</sup>。因此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国内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原来问题不在于,或者说不仅仅在于‘规范’的缺失,而重要的却是‘想象力’的贫乏”<sup>〔2〕</sup>。郭于华认为,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而是米尔斯所定义的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并且还承担着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和政治使命——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而“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心智品质,会导致全然不同的研究结果”<sup>〔3〕</sup>。

事实上,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和对实践的强调,成为2000年之后国内社会学界的一个新潮流。孙立平倡导的“实践社会学”,强调的是“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里指的实践不是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实践性或者应用性,而是指要面对“处于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社会现象”,就是“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为此他提出“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目的就是“为了接近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找到一种接近实践

---

〔1〕 吴小英,《社会学季节的更替》,《社会学家茶座》,2006年第4期。

〔2〕 闻翔,《〈社会学的想象力〉:五十年后再回首》,2009。

〔3〕 郭于华,《社会学的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社会学家茶座》,2006年第1期。

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在分析中发现实践的逻辑<sup>〔1〕</sup>。这种实践社会学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分析。因为“市场转型的实践逻辑往往是在那里产生的，也往往是在那里体现出来”。孙立平指出，这种“日常生活”视角是一种“与‘自上而下’的视角和‘自下而上’的视角都不相同的视角”，对日常生活的强调，“不是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做是一个完全自主的领域，而是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和互动的舞台”。因此，我们要采取的是“强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的均衡和整合。实现这种均衡和整合的关键，就是关注作为国家和民众相遇并互动舞台的日常生活”<sup>〔2〕</sup>。与此同时，他强调，从日常生活的视角面对市场转型的实践过程，也意味着对正在形成的底层社会的关注。

本书所推崇的日常生活的社会学，除了实践社会学所强调的重视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关注底层社会、从表面纷繁的现象背后发现“隐秘的机制”（或称“潜规则”）等特点之外，更突出了女性主义的视角。这种视角强调将研究者本人纳入被研究者的对象群体当中，关注来自底层的普通女性的个人体验和主体声音，从中发掘出两性关系背后所蕴藏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统治支配模式。这种性别视野中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试图从主流社会所忽略的边缘立场和日常生活实践出发，解读出不同于官方图景的现代性的另类图式。它对情境性的强调，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策略中对过程性的强调，在方法论取向上是相近的，都包含着对西方主流研究范式的批判意识和在本土化问题上的有益尝试。

虽然如此，本书却算不上是日常生活社会学的典型著作。它

---

〔1〕 参见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2〕 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2002。

只是收集了近10年来本人在女性主义理论和中国的本土研究中的主要心得和成果,并把它们放置在关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的理解框架当中。全书分为上编和下编两大部分:其中上编主要为理论探索和评述,这一部分收集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关于女性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探讨上,包括对主流社会学的批判与重建、有关方法论问题的争论和困惑以及知识建构的主要范式等等,然后分析作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传入中国后的遭遇以及对于中国本土性别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启示;下编主要为经验议题的研究,这一部分收集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关于中国本土议题的讨论和经验研究上,包括市场化与性别、代际冲突与青年话语以及性骚扰的不同诠释等等。每个议题之间看似不同,彼此却存在着连带关系,均可置于现代性的不同图解和个人困惑当中,而女性主义方法论为此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本书当然也算不上是典型的女性主义著作。上编理论部分基本上可以视为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西方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视野中的女性主义;下编经验部分则可以视为女性主义视角的中国本土经验议题梳理和日常现象分析,突出的是性别议题与全球化、国家、市场、传统文化以及社会变迁等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但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并没有明显的女性主义意味。本书贯穿始终的理念是,回归日常生活实践,既是女性主义方法论的精髓,也是社会学研究在中国本土议题上的最后出路。

上编

## 女性主义方法论

“他者”的经验 and 价值——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尝试

当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

女性主义知识社会学素描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及其对中国本土研究的启示

女性研究与社会学相遇的中国语境：方法论视角的回眸



## “他者”的经验和价值<sup>\*</sup>

### ——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尝试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兴盛是 20 世纪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它起源于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政治风暴,因此可视之为女性主义向文化界、学术界的进军<sup>[1]</sup>;同时它又与同

---

\* 本文最初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6 期,文中部分英译名有改动。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00 年年度课题“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流派研究”以及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赴美交流项目“女性主义对社会学的影响”的成果之一。文中所需的许多资料直接得自本人 2000 年 11 月至 2001 年 11 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期间该校社会学系 Barrie Thorne 教授的慷慨提供,同时,与她就女性主义社会学相关问题的讨论也让我受益匪浅。此外,孟宪范老师对本文初稿的修改提供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谨表谢忱。

[1]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是指 19 世纪中叶到 1920 年代的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诞生于 1960 年代,西蒙·德·波娃的《第二性》(1949 年出版)和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 年出版)为这次浪潮提供了理论基础。关于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以及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可参见拙著《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导论”中的论述。

时代风靡西方的反主流文化浪潮相契合,带有很强的反主流意识和批判意识,因而常常被归类为批判理论或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与女性主义在其他学科的表现相类似,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集中于对学科本身的男性中心导向的批判,倡导在女性经验基础上建立新的学科范式。尽管女性主义自身在社会学话语的批判与重建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分歧,主流社会学界对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工作也有各种评价,但学术界已经无法对19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发出的声音置之不理,当代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流派的教科书都无法将女性主义理论或性别分析方法排除在外<sup>〔1〕</sup>。由于立足于一种全新的社会性别(gender)视点,强调女性作为“他者”的经验<sup>〔2〕</sup>和价值,女性主义社会学开辟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图景,这种尝试对社会学很具启发意义,西方

---

〔1〕 如华夏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系列读本中,都包含着与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相关的章节和内容。参见[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下),2001年版;[美]艾尔·巴比《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下),2000年版;[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2000年版。

〔2〕 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文化长河中,男人是作为绝对的主体(the Subject)存在的,人就是指男人;而女人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和附属体存在,是男人的客体 and “他者”(the Other)。由于女人一直被界定为天生的“他者”,现实世界被认为是男性主宰和统治的,因此两性之间不可能存在平等。要使妇女走向真正的解放,必须摆脱“他者”地位,成为真正“独立的女人”。参见[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上、下),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却看到了女性作为“他者”所独有的经验和价值,认为它可以克服男性经验所具有的偏颇而成为更加富于人性的知识的来源。文中所说的“他者”就是指女性主义强调的女人相对于男人所处的边缘化的、陌生人的特殊处境和地位。



女性主义也因此学界获得了自己一块稳固的地盘。

## 一、女性主义介入社会学的背景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西方女性主义是在 1970 年代介入各学科的。此时,西方社会学领域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现象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机遇:一是长期以来社会学内部形成的对女性或性别问题的普遍忽视;二是社会学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的式微和反实证主义潮流的兴起。

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女性被大大地忽略了。她们一般仅仅出现在像家庭、生育、性等较为狭窄的研究领域之内,正如在实际生活中女人的空间仅仅局限于这些所谓个人、身体和家庭等私密领域一样。因此,关于女性的研究在传统社会学中处于边缘位置。这与她们在社会中的边缘位置极其一致,也体现了社会学的创立者们有关这一学科的最初梦想:即社会学就是以自然科学的技巧和模式去如实描绘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他们相信,在社会世界中,如同在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合理的自然秩序,而关于女性和家庭的位置就是构成这一合理秩序的一个部分。

在社会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功能主义那里,社会是个有机整体,而家庭一向被视为社会的一个功能单位。由于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天然差异,女人的功能只能是在家庭里承担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女人服务于家庭中的男人,而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则由男人来承担。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分工和功能分化,构成了社会有机体趋于稳定和平衡以及社会演进合理化的一个基石。因此,是女性的自然状态造就了劳动力的分工和男性权威的